

# 论唯物史观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

——兼论鲁迅对建设文学活动发生学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李衍柱

(山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本文以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中心, 评述了学界惯用的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途径, 着重论述了唯物史观为文学活动发生学提供的方法论基础和引起研究的新局面, 探讨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劳动说”的贡献和不足以及鲁迅结合中国史前艺术的实际提出的“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文学活动发生学; 方法论; 唯物史观; “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

文学何以发生? 文学从何时发生? 人类原初文学的发生具有一些什么特点? 我们如何去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 诸如此类的追问, 都属于文学活动发生学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1</sup>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 就应从它产生的历史起点开始, 研究它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条件下发生发展的轨迹。对文学活动发生和起源问题的深入研究, 自然又会遇到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只有沿着科学的方法论前进, 才有可能从历史的中轴线上揭示出文学活动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本文拟就唯物史观的创立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法论为中心命题, 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以求教于广大读者。

## 1

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问题,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问题。研究方法和途径的不同, 也就产生了对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的看法的差别。

综观中外学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方式和途径, 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可称之为考古学的方法。这是研究史前艺术发生、起源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方法。它为艺术活动的发生、起源提供最可靠的事实根据。这种方法的运用, 往往与研究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1879年世界上第一个史前艺术洞穴——阿尔塔米拉洞穴在欧洲被发现, 经考古学家对洞穴岩壁上的雕刻和绘画的比较研究, 一般认为成熟的史前艺术, 大约在3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已开始出现。1940年又在法国中部和西班牙北部发现拉斯科克斯(Lascaux)艺术洞穴, 以后又陆续在欧洲和亚洲发现了新的艺术洞穴和在山石上远古的岩画。这些史前艺术洞穴和岩画的发现, 对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研究, 提供了第一批人类远古艺术的史实。

第二种方式是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

学、民俗学的研究方式结合在一起，交互运用。摩尔根 1871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1871 年泰勒出版的《原始文化》、格罗塞于 1894 年出版的《艺术起源》、列维-布留尔于 1910 年发表的《原始思维》、1922 年詹·乔·弗雷泽出版的《金枝》和 1962 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就是一些主要的代表作。列维-斯特劳斯就将他运用的方法称之为“进步—倒退”法又称为“倒退法”。“在第一阶段，我们观察经验材料，在其当前状态下分解它，尽可能地深入到过去中去，设法把握它的历史经历，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加以澄清，以便把它们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接着开始第二阶段，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平面和另一个不同的层次上重复着第一个阶段……”<sup>2</sup>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确定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对象，并从文化学、思维学等视角对史前艺术的发生作了较深的研究。

第三种方式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这可以皮亚杰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瑞士学者，皮亚杰就是从分析儿童心理的发生入手，写出了《发生认识论原理》、《儿童心理学》等著作。研究儿童心理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对于理解和研究原始人的心理发生是有启迪意义的。维柯在《新科学》中，就把原始人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代。马克思也吸取了维柯的这一观点，用来论述古希腊文学活动的特点。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文艺活动的发生。他认为：“艺术的产生并不是纯粹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发洩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了的冲动。”<sup>3</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原始文化，包括史前的岩画的研究、艺术活动的发生与发展的研究，引起重视，并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影响著作，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等。关于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的方法问题，钱中文提出了从发生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新思路，已引起学界的重视。他说：“发生学就是把对象的发生看作一个过程，研究它的产生过程中的种种因素，辩证地了解 and 认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综合地、系统地观察对象的形成与演变。”<sup>4</sup>在探讨文学活动的发生和起源时，就应从它产生的萌芽状态去探讨它，把握它，用历史的眼光去了解它。要采取多视角、多层次、多方面，从考古学的观点，从生理学的观点，从思维语言学的观点，从审美的观点，从心理学的观点，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也即从多种角度和方法去加以观察和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做出相应的结论。按照钱先生所论述的从发生学角度研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起源：1、需要明确文学活动的发生学的对象是文学活动起源阶段的形态，即文学活动的原始形态，是“艺术前的艺术”形态，那是文学艺术的真正萌芽形态，而不是后来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学形式。2、从发生学角度看，应研究原始文学或者文学产生时的动因，从社会、心理、审美等方面，探索原始初民进行精神创造的契机。3、要研究前文学的形式及其发生的动因，就应进一步研究原始初民的思维特征和语言特征。4、应对人的生理本性中的审美特性，加以探索和研究。“人的本性具有一种创造的天性，审美的天性成分或是条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着各种变化。这是为艺术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这种生理上的潜力如何发展起来，如何促进人的真正的艺术创造，汇入艺术作品，这一领域目前深入者不多。”<sup>5</sup>钱先生精心撰写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可视为按照这一新思路和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新成果。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尽管学者们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方法，但总的说，这些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又都是力图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样自然就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本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为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6</sup>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其它各种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sup>7</sup>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指明了新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自然关系。”<sup>8</sup>史前艺术的起源是以原始人类的出现为前提。据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史前时代存在着4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类似猿的动物变成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时间大约在700万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两足行走的物种繁衍成许多不同的物种，约在700—200万年之间；第三阶段以脑子扩大为标志，这是人属出现的信号，逐渐发展成直立人和智人(Homo sapiens)；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已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工具的制造。<sup>9</sup>在现代人类出现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10</sup>“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sup>11</sup>在劳动实践过程中，自然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仅创造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在实践中改造了人自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sup>12</sup>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原始人除了能够从事打猎和畜牧外，又能从事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sup>13</sup>“以致像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sup>14</sup>

史前艺术的发生与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意识、语言的产生是相伴而行的，又是与史前的极端艰难困苦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的产物。”<sup>15</sup>马克思在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笔记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提出和原则上论述了有关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和起源的一系列问题，为后继者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明确指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马克思认真地做了大量笔记，并准备写一部专著来研究《古代社会》，但未能如愿，后来由恩格斯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该书的第1版序言中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sup>16</sup>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和起源问题，实际也是一个世界上上古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因此对人类史前史及其各方面情况(包括史前艺术)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虽未对人类史前艺术作专门研究，但他们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出的观点却给后人以启示。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于1894年发表的《艺术的起源》，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及艺术活动与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他是第一个从艺术领域收集证据”<sup>17</sup>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从而在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艺术起源问题研究的对象

应是史前社会与史前艺术。

第二，思维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发生问题。维柯在《新科学》中曾对原始人类思维的特点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原始初民的思维是“诗性的智慧”，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命的想象力。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历史唯物地说明了人的思维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一切都是废话。”<sup>18</sup>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sup>19</sup>人的思维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已注意到在史前史的野蛮时代阶段，初民的想象力有很大发展。他说：“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强大的刺激力。”<sup>20</sup>也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学会如何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那些“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sup>21</sup>当着原始初民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如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节奏感的愉快时，当他们看到东方日出、雨后彩虹而欢呼雀跃时，当他们听到黄莺百灵的优美、起伏、强弱的鸣叫而特别高兴时，他们的审美意识就开始萌生了。

第三，语言的产生与原始初民文学活动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实践的观点，在多处论述了生产劳动实践在人自身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指出：作为文学活动的载体的语言，也是“从劳动中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sup>22</sup>人是能制造工具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的存在者。“语言是存在的家。”<sup>23</sup>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语言和意识的不可分性，指出：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sup>24</sup>（着重号引者加）语言的产生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语言的产生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同步的。如同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确切地说，诗发生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保护着诗的源始本质。”<sup>25</sup>马克思在关于人类学的笔记中，对于语言的产生与原始文学的发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加以关注的。在人类蒙昧期的低级阶段，即他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期，“音节清晰的语言”已开始出现。到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即“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器开始，终止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用文字书写作品。”<sup>26</sup>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早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如果它产生更早，那么在这时已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方面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有如下述：（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使用的表音符号；（5）拼音字母或写音。”<sup>27</sup>这种语言文字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过程，二者是相随而行的。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对原始艺术的产生作了如下的概括：“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sup>28</sup>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原始初民语言文字的发生、形成与文字书写作品的出现、艺术的产生的论述，人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大体上应在摩尔根称之为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关于艺术起源和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学术专著，仅从上面这些有关的观点和论述中，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论述，无疑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 3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他运用唯物史观多方面地研究了原始艺术，批判地吸取了格罗塞研究成果，在回答劳动与游戏何者在先、何者在后问题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艺术发生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以书信的形式撰写的《没有地址的信 [1899-1900]》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学术专著。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在生前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及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文学艺术起源的许多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在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上的特殊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在世界艺术史研究领域，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自觉地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原始艺术研究的理论家。他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中写道：“在这里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象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sup>29</sup>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sup>30</sup>对于唯物史观原理，他作了具体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说，即：①生产力的状况；②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④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⑤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sup>31</sup>他把“社会心理”看作是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中介，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社会心理。不研究社会心理，要想对艺术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审视了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关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各种不同学说，批判了其中的唯心的、形而上学成分，吸取其有价值内容。普列汉诺夫在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学中的达尔文生物学的观点。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美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是从动物哪里发展而来的。<sup>32</sup>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是把人类的起源当作物种的起源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的着眼点“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地，达尔文主义者最光辉的发现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而只能为他们准备好基础”。<sup>33</sup>普氏认为，对美感的起源不能用生物学观点来解释，应以生产劳动实践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学观点来解释。动物对色彩、光线、节奏的辨别能力，只是一种发展成美感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而人的美感的产生，恰恰是人赖以生存的许多客观条件。“这就决定于他们在其影响下受教育、生活和行动的那些条件。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趣味和概念。”<sup>34</sup>动物由于不可以有人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诸多的产生美感的条件，因此它们所具有的色彩、声响、节奏的感觉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变为同人一样的的现实性。

第二，“劳动说”的确立。普列汉诺夫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从游戏与劳动的关系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问题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不同于“游戏说”、“巫术说”的“劳动说”。在格罗塞那里，已注意将艺术起源的研究与原始初民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他说：“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sup>35</sup>但格罗塞的艺术史观留有二元论倾向，在谈到艺术活动发生的条件时，他又把“游戏说”的倡导者提出的“艺术冲动”看作是艺术活动发生的“首要条件”。格罗塞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前止步了。普列汉诺夫正是在格罗塞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说”的主张。他认为，“解决劳动和游戏——或者也可以说，游戏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在阐明艺术的起源上极为重要的。”<sup>36</sup>他吸取了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关于“游戏是劳动的产儿”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坚决地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下面这个思想，那末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sup>37</sup>普列汉诺夫研究了各种原始艺术产生的历史条件后指出：原始社会中，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是一种快乐。“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sup>38</sup>先民们的审美趣味，也总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论在这里和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可以成为生产力状况的准确的标志。”<sup>39</sup>

对于普列汉诺夫提出和论证的“劳动说”的理由，学界也并非完全赞同。有的学者已经对他的关于先民最初从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能说对了问题的一半。比如，原始初民在进行生产工具制作时，他们的创造活动。就显示出了两重性：一是他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实用目的，二是他意识不到他的活动的美，意识不到他制作的工具已含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因素。所以后人从原始的工具上感觉到的美，对于那些制造工具的原始人来讲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只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无意识表现。“这就是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它的实质所在。”<sup>40</sup>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给以理论上的说明。

#### 4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原始艺术提出的“劳动说”，毕竟是具有开创性的，因而它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从翻译普氏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入手的。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头，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sup>41</sup>他说：“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sup>42</sup>过去谈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广为流传的是蒲氏的“劳动说”，提到鲁迅也仅是举出“杭育！杭育！”的一段话以印证“劳动说”的正确。实际上鲁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既继承和借鉴了普列汉诺夫的方法与观点，批判地吸取“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和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感情体验传达说中有价值的成分，又紧密地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发生论的新观点。鲁迅的著作中涉及文学活动发生论的主要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门外文谈》、《艺术论》中译本序等。综合鲁迅的观点，他对文学活动发生、起源的主张可概括为：“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论。最能代表他的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话：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单从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43

关于“劳动说”，鲁迅作的重要补充是文艺起源于劳动，要有条件，不能过度，进而引发出“劳动——休闲”说。他说：“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不要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sup>44</sup>鲁迅讲的诗歌起源的第二个原因宗教，着重指的是巫术。他认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sup>45</sup>巫，“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祝，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犷獠，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sup>46</sup>谈到小说的起源，鲁迅提出了劳动休闲讲故事的缘由。原始初民闲暇时间讲的故事主要是神话传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衍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sup>47</sup>正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又赞同学界关于“小说起源于神话”<sup>48</sup>的说法，提出“神话是文艺的萌芽”的观点。<sup>49</sup>

鲁迅与西方的艺术史家相比，在探讨文学活动发生时，他特别提出了文字的起源问题。认为文字的起源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的发生是同步的。文学活动的发生可分两个大阶段：一是前文学阶段，即口头传说阶段，如鲁迅所说，“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sup>50</sup>二是文学阶段。用符号或文字记载下来的原始初民的神话传说、民谣、山歌、渔歌、寓言等。这些大都是“无名氏的创作。”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工，才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

鲁迅关于文学艺术起源与发生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的文学活动发生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鲁迅先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史前艺术的实际，提出的“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是对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的进一步的发展。鲁迅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鲁迅充分肯定普氏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和普氏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他看来，普氏提出的“劳动说”，“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批判主张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sup>51</sup>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肯定与赞扬普氏研究艺术发生与起源的方法论和他所主张的“劳动说”上面，进而将唯物史观的原理与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解，来补充和丰富、发展普氏的“劳动说”。鲁迅肯定“劳动”发生说，着重强调的是艺术发生的社会根源、现实条件和内在的动力。鲁迅认为，研究艺术的发生学问题，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倘只就艺术而言，则是人类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种种概念)，是被那为它移向现实

的条件(历史底概念)所提高的。这条件,自然便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sup>52</sup>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生产劳动实践,人才成之为人,人才逐渐学会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创造,并在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中,使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成为现实的存在。脱离人的社会实践,脱离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物质的、精神的、审美的需要,艺术的发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动力。“劳动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将文学艺术发生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第二,鲁迅充分重视神话—巫术—宗教与文学发生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在力倡“劳动说”的同时,相对而言,对“巫术说”、“宗教说”重视不够。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史家,他正视中外文学史、艺术史的实际,明确指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在具体论述时,鲁迅又着重谈了神话与巫术对文学发生、起源的意义。他认为,神话为“宗教的萌芽”,<sup>53</sup>也是“文艺的萌芽”。<sup>54</sup>“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了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sup>55</sup>鲁迅对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有着深入系统地研究。他的这些论述是令人信服的。神话是讲神或半神半人的故事、传说。由于神与人是相互隔离的,人要与神联系,其中介则是巫。巫是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时期中最有文化的一部分人。文字的创作与使用,同巫的颂祝、记事活动,是分不开的。在鲁迅看来,古代象形文字的创作与先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艺术活动的出现,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结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峭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鱗魴鳣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sup>56</sup>而在远古时代,以创造和使用文字为主的人则大多是巫史。巫,“职在通神”,他们是“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sup>57</sup>原始人的诗、歌、舞是不分的,如《乐记·乐象篇》所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原始的歌舞与巫术礼仪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原始的文学艺术的因子就寓于巫术仪式之中。巫和巫术仪式,不仅是人类史前期(未有文字记载之前)艺术活动发生的主要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而且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鲁迅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检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sup>58</sup>鲁迅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前者他以先民在劳动时发出的“杭育,杭育”号子为例加以说明,后者显然与巫史对神灵的赞颂、问卜、记事和为文作韵言有关。鲁迅依据大量中国古代文献的记叙而作出的论断,不仅富有中国特色,而且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见,文学活动发生的“巫术说”,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鲁迅提出的小说起源于“休闲”的主张,是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所作出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我认为,“休闲说”是对“游戏说”的继承与发展。它首先是从文学活动创作主体的心态方面讲的。康德、席勒、斯宾塞提出的“游戏说”,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游戏说”较早地将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审美活动联系起来,注意揭示文学活动的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的自由的本质。在中国文论史上,首倡“游戏说”的是王国维。他在1906年写的《文学小言》一文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

发而为游戏。婉孌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洩，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詠叹之，以发洩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sup>59</sup>王国维的文学活动发生论，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他的游戏说，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的审美的自由本质。鲁迅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并结合中国小说的发生的实际，提出的“休闲说”，有力地说明文学活动的发生，是在创作主体完全处于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自由状态下出现的，它本身并无具体的实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去追求某种科学的认识价值或道德价值，而是为了寻求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sup>60</sup>人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有时甚至是在死亡线上从事最艰苦的劳动。鲁迅认为中国古代为什么神话传说不如西方发达，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华民族最先居住的黄河流域，自然条件非常差。为谋生起见，先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sup>61</sup>太劳苦，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还有什么心思去从事文学活动呢。因此，先民们只有在劳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才会去寻些事情“以消遣闲暇”。人们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时，既无皮肉筋劳之苦，又无精神上的重压，而“消遣”的方式是自由选择的，其形式和种类又是多种多样的：游戏者有之；狂欢歌舞者有之；围在一起讲述个人所见所闻的新奇的故事者有之……后者就成了现代小说发生的重要源头。我们说“休闲说”是“游戏说”的补充与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鲁迅提出的小说起源于劳动之余的“休闲”，实际上还涉及到文学活动的创作主体是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的问题。马克思对人能否获得“自由时间”的问题非常重视，他说：

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sup>62</sup>

先人们正是由于他们能够从生存竞争和繁重的劳动之余，获取到一定的“自由时间”，才使他们有可能“变为另一主体”，即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主体，而只有当他们以这另一主体的角色开始直接从事文学艺术活动时，文学艺术活动才能真正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原始的先民们所能获得的“自由时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要创作出大型的戏剧和长篇小说，在人类的史前时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会成为现实。恩格斯甚至把充分的“自由时间”的获得，看作是科学、艺术繁荣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享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sup>63</sup>（着重号引者加）因此，“自由时间”的获得，不仅是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未来艺术走向空前繁荣的重要条件。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鲁迅先生在中国是有开创之功的。他不仅亲自将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译介给中国读者，而且对中国小说、诗歌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他提出的“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说，在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领域，具有综合创新的性质，显示出鲁迅先生的卓尔不群的学术个性。对此，我们应将它放在中外关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 Materialistic Historic View and Study of Origin of Literature: And Lu Xun's Contribution to Study of Origin of Literature

LI Yan-zhu

(Chinese Depart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literature. The emphasis is on the methodology for and new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literature brought by materialistic historic view. It also deals with the contribution and shortcoming of the doctrine of "labor generation" by Puliehanov and the value of the notion of "labor – religion (magic) – leisure" offered by Lu Xun who finds his inspir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t.

**Key words:** origin of literature; methodology; materialistic historic view; notion of "labor – religion (magic) – leisure"

收稿日期: 2003-11-15

作者简介: 李衍柱,男,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参考文献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 <sup>2</sup> (法国)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8页。
- <sup>3</sup> (奥地利)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 <sup>4</sup>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 <sup>5</sup>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 <sup>7</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3页。
- <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 <sup>9</sup> 参见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 <sup>10</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 <sup>1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 <sup>1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 <sup>1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 <sup>1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 <sup>15</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 <sup>16</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 <sup>17</sup> 见格罗塞《艺术的起源·重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sup>18</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页。
- <sup>19</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374页。
- <sup>2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 <sup>21</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 <sup>2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6-377页。
- <sup>23</sup>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页。
- <sup>2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 <sup>25</sup>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上海远乐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 <sup>2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 
- <sup>2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 <sup>28</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 <sup>29</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 <sup>30</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页。
- <sup>31</sup>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95页。
- <sup>32</sup> 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6页。
- <sup>33</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 <sup>34</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320页。
- <sup>35</sup>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3页。
- <sup>36</sup>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页。
- <sup>37</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 <sup>38</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 <sup>39</sup>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 <sup>40</sup>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 <sup>41</sup>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 <sup>42</sup>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页。
- <sup>43</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303页。
- <sup>44</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 <sup>45</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 <sup>46</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 <sup>47</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 <sup>48</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
- <sup>49</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 <sup>50</sup>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 <sup>51</sup>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 <sup>52</sup>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 <sup>53</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 <sup>54</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 <sup>55</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
- <sup>56</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 <sup>57</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 <sup>58</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 <sup>59</sup> 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66—767页。
- <sup>60</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303页。
- <sup>61</sup>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 <sup>6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226页。
- <sup>6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